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研究课题

陕西民办高等教育 发展研究

丁 剑 苗禾田 编著



SHANXI MINBANGAODENGJIAOYU
FAZHANYANJIU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研究课题·

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丁 剑 苗禾田 编著

陕 西 出 版 集 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丁剑,苗禾田编著.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450-0571-4

I. 陕… II. ①丁… ②苗… III. 民办学校:高等学校—研究—陕西省 IV.G64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0161 号

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编 著 丁剑 苗禾田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西安丈八五路 58 号) 邮编:710077

印 刷 西安华新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32 开 6 插页 8.75 印张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0-0571-4

定 价 28.00 元

序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有人把它称之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陕西现象”。陕西地处我国中西部结合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办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原因和经验是什么?目前存在危机和问题有哪些?陕西民办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前景和方向是什么?西京学院丁剑和苗禾田同志主持完成的陕西省社会科学界重大研究课题“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成果力求科学地回答这些问题。

要回答这些问题,既需要理论科学基础,又需要丰富的实际经验,更需要进行深入의专题研究。我原在西北大学工作,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20 余年。西北大学是一所公办大学,由于工作需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同我省民办高校的一些创业者有过一些接触。自 2005 年初退休后,来到一所民办高校从事民办教育研究,虽然先后发表过一些关于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论文和专著,总感到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感悟仍然比较肤浅,有许多问题仍然处于困惑之中。

丁剑同志长期在民办高校工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研究成果;苗禾田同志曾任西安市第三届社科联副主席,现担任西京学院《民办高教论丛》特约编辑,对民办高教也有相当的研究。由他们主编的《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一书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一、选题明确,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大。该书属于省社科重点研究课题成果,瞄准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主题,解剖民办高等教育“陕西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以陕西历代民间教育家与高等教育机构为起点,详细分析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轨迹和未来趋势,具

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

二、以事实为依据,不崇尚空谈。全书十一章,每章都列举了大量事例和数据,用事实说明问题,所有事例数据均有来源出处,论据充分,说服力强。作者工作单位在西京学院,书内论述中从实际出发,态度不偏不向,表现出热爱科学、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该书追求创新,独辟蹊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既有深入的理论分析,又有操作性较强的对策研究。在进行大量事实分析的基础上,第十章对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进行了专门探索,科学地总结了陕西民办高校理论创新成果,对陕西以及全国民办高等教育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第十一章的对策研究中,作者提出了解决陕西民办高校发展五大“瓶颈”的若干条对策,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总之,该书对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既进行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又对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探讨,是一本可读性和实用价值都比较强的好书。

梁克荫

2008年12月10日

(本文作者是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目 录

第一章 陕西历代民间教育家与高等教育机构	(1)
第二章 陕西民办高校在新时期的发展概况	(54)
第三章 陕西民办高校在发展中的竞争特点	(77)
第四章 民办院校面对的四大市场	(86)
第五章 陕西民办高校十强及其他	(99)
第六章 陕西民办高校主要办学及理论研究策划人	(145)
第七章 陕西民办高校:奇招频出,“黑马”惊世	(181)
第八章 陕西民办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十大要素	(197)

第九章 陕西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曾经发生的重大不良事件 及其教训	(205)
第十章 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与探索	(214)
第十一章 陕西民办高校的发展“瓶颈”与对策研究	(227)
后 记	(273)

第一章 陕西历代民间教育家与高等教育机构

陕西最早的民间教育家——老子

周至县东南 15 公里的楼观台坐落在终南山北麓，相传周大夫函谷关令尹曾在此结草为庐，以观天象。他看见“紫气东来”，知道有真人从此经过，果然，迎来了道家鼻祖老子。老子，姓李，名耳，是先秦时代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古代思想家。老子在楼观台写成《道德经》5000 言，并且在楼南筑台讲经，故楼观台又名“说经台”。老子也成为陕西最早的民间教育家，传说孔子、孙子都曾听过他讲经，拜他为师。楼观台也成为陕西最早的民间教育基地。

楼观台依山带水，茂林修竹，绿荫蔽天，景色清幽。《陕西志》载：“关中河山百二，终南为胜；终南千峰叠翠，以楼观最名。”相传，周穆王曾到此游历，建造宫室曰“楼观宫”。秦始皇在楼南建宫，前来求仙敬神。汉武帝在楼北曾建宫殿。晋惠帝元康年间，在这里植树 10 万株，移民 300 余户。南北朝时，北方道士多集中于此，形成势力庞大的“楼观派”。唐高祖李渊尊老子为远祖，改楼观为宗圣宫；唐玄宗又以夜梦老子为名，改宗圣宫为宗圣观，楼观台迎来最辉煌的鼎盛时期。从此，楼观台一直被奉为道家圣地，亦称“仙都”。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若县后乡曲里人也。姓李氏，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行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

而已。”

孔子去，谓其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道德经》文仅 5000 言，但文约义博，其中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十分丰富、深邃。老子的辩证法综合了阴阳对立和对立统一的观念，并加以发展和创造，形成了辩证的宇宙观。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两者哪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老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唯物主义的。如，他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下万物都是由道转化而成。道既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又是物质世界的实体，即宇宙本体。

老子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这从《道德经》中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说明老子并不轻视社会实践。身为极富智慧的老子，他的知识除继承先民的间接经验外，更多的还是源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他的认识既重视实践经验，也重视理性思考，显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特色。

《道德经》里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至今仍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无为无不为”、“上善若水”、“治大国如烹小鲜”、“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爱民治国，能无为乎”。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顺任自然之道。他认为只要有道的圣人、侯王实行这种“无为之治”，不去扰民，就能顺乎自然，合乎人情，老百姓也就会驯化、端正、淳朴、富足。那些礼乐、政刑、税赋等有为的制度，也就不必去实行了。老子的无为思想，有着进步的一面，对于我们今天建立“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陕西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西汉太学

陕西历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是西汉时期的“太学”，它创立于汉武帝当政时期。理论界也有人把“太学”称作“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国立大学”（《趣闻陕西》“最早的国立大学”，旅游教育出版社）。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术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学派纷纷创立，不同的学术代表人物设坛讲经、招徒著书、多方游说，在“七国争雄”中各显其能。道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儒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墨家（以墨子为代表）、兵家（以孙子为代表）、法家（以李斯、韩非子为代表）、纵横家（以苏秦、张仪为代表）、阴阳家（以鬼谷子为代表）等等，在历史舞台上尽展各自的才华，以各自的学术观点及积极的行动介入春秋争霸“治国平天下”的争权拼斗，演绎出一幕幕雄壮惨烈的历史剧，先后出现并形成了“春秋五霸”的局面。最终以“秦王扫六合”，取得一统天下，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秦王朝为结局。学术方面，则以李斯、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居于统治地位，并通过秦始皇之手演绎了“焚书坑儒”的历史惨剧。坑杀了460名以儒家学说为依归的“儒生”，焚毁了以儒学著作为代表的多家学术著作，滥用强权以期推行法家思想和秦王朝的各项制度、法令。

在这场惨烈的权力斗争中，以“克己复礼”为旗帜，企图复周礼、兴灭国、继绝世，恢复奴隶制秩序的儒家遭到近乎毁灭性的打击。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当西汉经过“文景之治”（当时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之后，进入了国力日益强盛的汉武帝统治时期。

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向汉武帝谏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提出兴建“太学”，大力培育独尊儒术的栋梁之才，为西汉统治者服务。董仲舒这里主张的“儒术”，和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被称作“孔孟之道”的儒家学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他扬弃了

孔子学说中恢复周朝奴隶制的政治目的性,赋予“克己复礼”以克制私欲维护西汉封建统治制度的全新含义。其次,他阉割了孟子学说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皆可以为尧舜”、“苛政猛于虎”的民主内核。经过董仲舒改造后的“儒术”,其核心成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其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董仲舒完成了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的更新改造,使之演变成直接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以巩固封建政权统治的“儒教”。因之,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恩准,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局面逐步形成。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和孔孟之道虽然有继承关系,然而又有了某些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有些甚至可以说是质的变化。

在太学里,教师被称为“博士”,学子被称为“太学生”。公元前136年,开设了《诗》《书》《礼》《易》《春秋》课目,并设了“五经博士”,允许他们自行授徒。公元前124年,新提升的儒士丞相公孙弘,奏请朝廷为博士招收弟子员(即太学生),得到汉武帝的允可。朝廷拨款在长安城南修建了宏大的校舍,太学从此正式诞生。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历史上官方创立的第一所国办大学。

太学初期,仅有弟子50人,由“太常”推选年龄在18岁以上,仪容端正者为博士弟子。郡国县官,也可举荐地方上喜好文学、尊敬长辈、称誉乡里的人,到太学受业,作为增设的非正式名额。随着太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到汉成帝时,弟子多达3000人。初时,求学的弟子不限达官贵人子弟,贫寒出身者经举荐也可入学。如倪宽家贫无力交学费,为太学生们做饭以换取所需费用,类似后来的“勤工俭学”、“勤工助学”;匡衡靠给人帮佣助读;翟方进靠母亲为人做鞋换钱供其读书。

太学“博士”(教师)以传授经学为业,有时也参加朝廷的议政活动。博士大都由学有专长的名流学者出任。太学生跟从博士受业,主攻一经或某经学一个学派的学说,表明太学的授课已经逐渐专业化、专门化,这样有利于学术的深化与发展。太学每年举行一次“岁试”,成绩优异者便有资格做官,在当时到太学就读成为通往官场的捷径,

“学而优则仕”成为一时之风尚。西汉太学培养了不少人才，最著名的有文学家司马相如，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的张骞等。

西汉太学在为国家培养人才，以维护汉代封建统治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为我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and 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陕西最早的民间出国访问学者、 佛学教育家、翻译家——唐玄奘

玄奘，姓陈，名祿，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小陈村人。他是生活于公元七世纪隋唐年间的僧人，于唐贞观初年只身从长安城出发，“偷渡”出境，前往印度取经求法。前后历时 19 年，独行 5 万里，足迹踏遍西域、中亚和印度。

玄奘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出国留学人员，由于他的勤奋、刻苦、博学、善思，更成为一位伟大的名垂千古的出国访问学者、佛学教育家。他在西行的十几年中，以丰厚的学识、超常的睿智、脱俗的气质、坚定的信仰征服了诸多国王和高僧，成为当时全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学者，影响力最大的佛学教育家。他写的名著《大唐西域记》，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和印度中古历史无可替代的宝典。玄奘至今在印度和国际佛教界依然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我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指出：“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他已经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于《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早已经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问题而不引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书。”

印度孟加拉佛陀达摩法会秘书长达摩帕尔指出：在古往今来的所有时代，在印中文化关系史上，玄奘确乎是一个起了最为重大作用

的人物。作为跨越万水千山的印中友谊使徒和悠悠文明古国的伟大学者,玄奘法师的肉体虽然已经不在人间,但他依然活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他那字字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通过他的著作,我们印度人今天才能了解我们的祖先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因此,我们对玄奘法师感激不尽。(《玄奘传》,团结出版社)

当初,玄奘以“偷渡者”的身份,在唐朝政府下令追捕缉拿阻止其出国的背景下,靠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既征服了漫漫长途的重重艰险,又博得了边地官员的敬意与庇护,这才完成了出国取经之举。

在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境归国之时,却因为他创造的辉煌业绩而受到了以唐太宗为首的所有官员和百万长安民众最热烈的欢迎。回国后,他又耗费整整 19 年时间,夜以继日地翻译了大量佛经典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空前绝后。在他传奇的一生中,他那舍身求法的伟大牺牲精神,他历尽艰难九死一生永不言弃的追求精神,以及他以平凡之身完成的非凡业绩,吸引着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的英名和业绩为全世界人民所敬仰和传颂。

在他归国后的 19 年间,共翻译佛经 75 部 2335 卷,如此大的翻译量,即使在今天有各种字典和工具书,并且借助电脑操作的条件下,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大雁塔是当年唐太宗敕建的专供玄奘使用的藏经塔,保存着玄奘从西域带回国的 625 部佛经、佛像和舍利。内置两块石碑,镌刻着唐太宗《大唐三藏圣教记》和唐高宗《述圣记》。慈恩寺大雄宝殿上有一副对联记载着世人对玄奘的敬仰:

法海仰奘公 西土亦称大遍觉

宗门创唯识 此地堪比那烂陀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所创立。他是当时迦毗罗国国王的长子,他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与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同时。他年轻时主动放弃王子的荣华富贵,为寻求解脱生老病死等人生痛苦之道而出家。他自己在证得了彻底觉悟之后,又广为说法,普度众生。佛教与

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由佛、法、僧三者构成宗教实体。

佛教分南传和北传,传到南方去的用巴利文,是小乘佛教经典。传到北方去的用梵文,多数是大乘佛教经典。巴利语是古代印度俗语,梵文则是古代印度雅语。

佛教经典的经、律、论称为三藏;汉译三藏有 1692 部,共 6241 卷。《中华大藏经》更多达 23000 卷。所以,民间又称玄奘为“唐三藏”、“唐僧”。当年玄奘在印度学习佛经、宣讲佛经的那烂陀寺,为了褒扬他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伟大贡献,专门修建了金碧辉煌的“玄奘纪念堂”,供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瞻仰。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条主要由儒、释、道三股巨流汇合而成的文化大河,几千年来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佛学诞生于印度,而大成于中国,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甚为罕见。佛教的东传与中国佛学的发展,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基因和巨大活力,也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伟大生命力和至大包容性。由此可见,玄奘在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所做贡献之巨大,后辈当永世不忘。

唐代勃兴的民间教育机构——书院

(一)唐代最早的“四大书院”

书院首先产生于民间,时间在唐代初年,起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四大书院”有:湖南光石山书院、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的张说书院。(《中国书院史》,中国东方出版中心)

据雍正《陕西通志》卷 27 记载:“瀛洲书院在蓝田县治南,唐学士李元通建。明弘治时,知县任文献重修。”据史书载:李远通,蓝田县

人,在隋为鹰扬郎将,归唐后高祖拜为定州总管,与农民军刘黑闼作战,兵败被俘,拒降死节,史称忠烈之士。

据嘉靖《青州府志》卷9载:“李公书院在临朐县西南,唐李靖读书处。一云靖从太宗征闽左,手此阅司马兵法。”李靖(571—649),京兆三原人。精通兵法,曾任隋马邑郡丞。归唐后,随高宗、太宗南征北战,为大唐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李世民赏识,官至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是“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

张说书院在永乐县花阳山中。史称:张说“过满城,筑书院于花阳山,以为藏修之所,后人名其居曰相公堂。”张说(667—730),字道济或说之,洛阳人。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中策贤良方正第一,授校书郎,入仕途。唐睿宗、玄宗时,三度拜相,并兼集贤书院学士,深得宠信。

关于光石山书院的记载甚少,仅知其建于湘东郡攸县(今属湖南)麒麟山。天宝七年,唐玄宗下令建造规模宏大的朱阳观作为供奉在此“升天成仙”的南齐司空张邕的祠宇。大唐皇帝姓李,称老子李耳为始祖,奉道教为国教,对这类修道成仙之事自然十分看重。每逢大旱,前来祈雨的人甚众,“无不昭应”。于是,“十方归从,纷若云臻”,都将张司空奉为神灵。

唐苏师道《司空山记》云:“自朱阳观远近,司空遗迹尚可寻访。东南隅有秀峰十二耸翠卓立……司空宅在山之西,……宅左有光石山书院,故基尚存。”由此可知,玄宗时代的苏师道一行人仅看到了光石山书院的“故基”,说明该书院建院早于玄宗时代(713—755)无疑。学界称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为初唐时期最早建立的民间书院。

(二)松洲书院:从私人习读转向公众教育机构的典型

民间书院出现以后,逐渐把服务范围从个人扩展至公众,产生了向社会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开始了“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活动,其典型代表是漳州龙溪松洲书院。

乾隆《龙溪县志》卷4载:“松州书院,在二十四都,唐陈珣与士民讲学处。”史载,陈珣,字朝佩,漳州首任刺史陈元光之子,遂入籍为漳

州人,被武则天“授翰林承旨直学士”。后“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君席宏聘至乡校,乃辟书院于松州,与士民论说典礼。……于风教多所裨益。”后曾接替父职任漳州刺史 10 多年,年老辞官归乡后,“复寻松州别业,聚徒教授”,直至逝世为止。

以此可知,松洲书院办学历史较长,主持人是陈珣,初时,他是以漳州文学教官的身份受聘于县令席宏。晚期则是以辞归故里的退隐官员的身份“聚众教授”的。书院创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松洲书院的教学形式多样,既有针对士民的社会教育,也有“聚徒”授业的专门教学。教学内容则为儒家经典礼仪。教授方法是“论说”、“开引”,重于启发,取得了“于风教多所裨益”的良好效应,显见是成功的。

史学界认为:松洲书院作为我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它以士民和生徒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成功地完成了从个人习读向面对公众施教的过渡,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唐代官办书院与民间书院的和谐发展

书院产生于唐代,源于私人治学的书斋与官府整理典籍的机构,这是书院产生的两大源头。民间书院与私人书斋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开放性。书斋是个私密空间,而书院则是向社会开放的,是一处公众活动场所,儒士、道士、僧人皆可出入。由私密至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根本区别。从私家独享走向服务公众,是书院从书斋中脱颖而出并走上独立发展的关键一步。

书院的另一个源头是官办的丽正、集贤书院,是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官办书院带有鲜明的“官本位”特征,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诸功能于一体。《唐六典》对其主要职责作如下表述:“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贵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以学术文化事业为职事,而无具体兼办的政务,这就是官办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官办书院里的工作人员均有官职,而且按不

同的职级从朝廷领取俸禄。官办书院有着把历朝历代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彰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的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民间书院在学术研究领域则有更大的自由度与开放度,对于官方的学术理论、学术观点,它有一定的从属性和传承性,同时还有一定的抗辩性与自主性。官办书院与民办书院的共存相容、互动互补,促进了唐代文化、艺术、学术的发展。尤其在社会动荡、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民间书院更彰显了它在传承文明、保存典籍、宏扬学术、保护人才等方面的独特功用。

(四)初期书院的规模发展及其功能

唐朝至五代时期,前后共 342 年(618—960),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共 70 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这段时期只是书院的起始阶段。分别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脱胎出来的书院,逐渐发育成长并日趋成熟完善,具备了作为文化教育的实施与传承机构的基本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寻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求学讲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交流学术,教学授受,讨论政治,关心时局,探究经史,研究著述,承担起传承、改造、更新、发扬华夏文明的重任。从此,中国社会就增加了一种崭新的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代代相传至近现代社会。由于西风东渐,东西方文化教育思潮的交汇与冲击,而进一步催生了具有鲜明的近现代文明特征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近代的大学堂(以京师大学堂为代表)和现代的国办大学(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与私立大学(以燕京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为代表)。

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 40 所,见于唐诗的另有 14 所,外加官府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共 57 所。其中 48 所可以确认其院址。这 48 所书院分布在现今中国版图的 12 个省区,分别为:陕西 7 所,山西 1 所,河北 2 所,河南 2 年所,山东 1 所,浙江 5 所,江西 7 所,福建 6 所,湖南 8 所,广东 2 所,贵州 1 所,四川(含重庆)6 所。从其他地域分布可以看出,以长江为线划分南北,南方的书院数量明显多于北方,这是否可以看作文化教育向南的大力渗透以及重心渐次南移的